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9月30日（第16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提出削减赤字和促进就业的新方案

奥巴马总统于上周一（9月19日）提出了削减赤字和促进就业的新方案，政府打算通过一系列措施在未来的10年内节约资金3万亿，这些措施包括：缩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减少多项政府支出计划，对富人征“巴菲特税”（“Buffet Rule”，美国投资家巴菲特最近称他交税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要低，主张对富人增税）。奥巴马的新方案遭到了一些议员的反对。

（来源：www.pattonboggs.com 2011年9月25日）

袭击事件频繁，巴基斯坦人抱怨美国

2001 年以来，巴基斯坦与美国并肩战斗，抗击塔利班武装和基地组织。自那时起，巴基斯坦境内发生了 335 起自杀式袭击事件，而在 2001 年之前，仅发生过一起袭击事件。巴基斯坦人因此而抱怨美国。

（详见：《华盛顿邮报》网站 2011 年 9 月 27 日）

经济学家称奥巴马的促进就业计划有助于防止大选年的经济衰退

奥巴马总统抛出了总额达 4470 亿美元的促进就业计划。彭博社为此调查了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经济学家称此举有助于防止经济衰退，降低来年的失业率。但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如财政部长盖特纳那样乐观，盖特纳曾引用了 GDP 增幅达 1.5% 的估计值。

（详见：彭博社网站 2011 年 9 月 28 日）

克林顿国务卿鼓励积极参与应对全球问题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9 月 22 日在克林顿全球行动计划（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年会上向特邀代表发表讲话指出：“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都面临的问题是，学会如何应对，帮助鼓励、调动和发挥已有的那种参与的热情。”她还表示，2011 年席卷北非和中东的街头革命有力地再现了这一新时代的特征。该会议每年对全球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探讨。

（来源：<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1/09/20110926161923x0.3663555.html>）

美媒：奥巴马推“富人税” 美茶党面临尴尬局面

美国《国际日报》25 日刊文说，奥巴马近日提出了针对百万元年收入人群的“巴菲特税”。对此举措，美茶党将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茶党所代表的是中、下产阶级，征富人税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不征富人税，就有可能征他们的税。但是增税是不符合茶党的理念的，茶党如果不表明反对态度，是不符合茶党的形象的。所谓富人税是指对家庭净资产在 720 万元以上的家庭开征 2% 的税，这类人只占美国总人数的 0.5%，但开征富人税后，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有 700 亿元的收入。

（来源：多维新闻网）

美媒：美企在华须遵从中国的审查规则

《华盛顿邮报》9 月 20 日报道，加拿大的 SecDev 智库的报告显示，尽管美国一直处于支持网络自由表达的前锋阵地之上，但是对于道德规范的自愿代码直至目前也没有制定出来。该智库

研究人员指责美国搜索引擎公司称，为了在中国拥有 4.5 亿互联网使用者的市场上做生意，美国公司所付出的代价是遵从中国的审查和监控政策。SecDev 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新的举措，即实施法律约束力和特别承诺，目前需要的就是能够确保美企能够在国内、国外均正常运行的政策出台。

（来源：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checkpoint-washington/post/us-companies-play-by-chinese-cyber-rules/2011/09/19/gIQAAUPNgK_blog.html）

重点关注

美智库谈如何提升美中战略合作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 Evan A. Feigenbaum 于 9 月 27 日在该智库网站上撰文，就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美中能否开展战略合作问题的最新报告相关内容指出，中美两国亟待开展合作，并对美中战略合作的困难和途径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中美之间无法开展战略合作的原因并非在于缺乏共同利益，而是缺乏将共同利益转化为现实政策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两国先要认清阻碍合作的两大困难。首先，中国通常无法认同美国对威胁的评估标准。以朝鲜和伊朗为例，这两个国家不会对中国造成直接威胁，因此中国常批评美国过分夸大了其受到的威胁。其次，即使中国可以认同美国对威胁的理解，利益冲突仍对两国合作形成了阻碍。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和美国都认同阿富汗稳定能有效遏制恐怖主义泛滥，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北约将在中国西部边境长期驻军，并加强与中国有纠纷邻国的合作，这又引起了中国的不满。

他进一步指出，中美通过对话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双方必须坚持三条底线。

第一，美中战略合作并不要求两国采取联合行动，但双方的行动应当是互补的。例如，中国和美国可以分别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安全协助开展禁毒行动，互相补充。这就要求两国战略目的进一步透明化，并对对方行动加深理解。

第二，美中战略合作并不要求两国实现联合应急处理，但双方应进一步提升协调能力。如两国可以协调处理食品安全方面的危机事务。

第三，美中战略合作并不局限于安全政策方面，事实上，双方的安全事务合作多以失败告终，如几度搁浅的朝核问题，两国可以从经济等方面入手加强双边合作。

他在文章中最后指出，在国家利益一致的背景下，美中两国亟待开展合作，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

（来源：<http://blogs.cfr.org/asia/2011/09/27/does-u-s-china-strategic-cooperation-have-to-be-so-hard/>）

美智库：美议员提出《2011 中国媒体互惠法案》，主张中美媒体需要更为公平的竞争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公共外交的高级研究员戴尔（Helle Dale）最近在该智库网站撰文指出，中美媒体在进行市场争夺战中，需要更为公平的环境。她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最为可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国家；有些人还很确信中国将会替代美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美国的立法者们现在终于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挑战不仅仅存在于军事和经济方面，而且正逐步向信息和公共外交领域蔓延。无论如何，一些国会议员决定促使美国勇敢面对，并且对中国政府企图在美媒体界自由的大环境之下蒙混过关的做法进行处罚。

戴尔在文中提出，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官方媒体（其新闻报道方面的工作内容与情报收集的工作很难区分）从美国国务院获得了 650 张国际记者签证；相较之下，美国广播理事会仅为“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记者们获得两张进入中国的记者签证。在这一背景之下，9 月 13 日众议院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还有泰德·坡（Ted Poe）提出了《2011 中国媒体互惠法案》（H.R.2899）作为对《移民国籍法》的修正案。这一法案背后的意思很明显：国务院应该发给中国记者与美国记者在华获得的相同数量的记者签证。除非中国改变它的做法，否则在该法案生效 30 天后，国务院将会撤消 648 张中国记者的记者签证。

众议员罗拉巴克还在努力确保美国政府不要在与中国的信息战中自束手脚。今年夏天他提出了一项针对国务院的消减拨款计划的修正案，以保护“美国之音”的普通话和粤语无线广播节目不受损伤，而之前美国广播理事会因为预算的原因打算在 10 月之前裁撤这些节目。该裁撤计划正在等待参议院讨论。

中国方面一直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联合国的媒体合作机构来推广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作为增强其软实力的推动器。这是一个由国际机构在全球范围进行管理并规范全球媒体市场的“公平主义”。今年六月，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相比，引领国际媒体秩序的规则已经明显落后。这种缺陷最首要表现国际交流中的极度不平等模式；信息流是单向的：从西方流向东方、北方流向南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在美国，中国媒体的进展——包括在时代广场大厦设立办事处、做广告和在美墨边境设立广播站——代表了一场由政府参与谋划的反不平的信息秩序的举措。而问题在于信息流通方面的市场自由。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接受新闻自由这一理念，那么不仅在华的外国媒体数目将会呈指数上升，而且中国的记者们也将毫无疑问地在美国受到欢迎。（晓雨编译）

（来源：<http://blog.heritage.org/2011/09/23/leveling-the-playing-field-in-the-u-s-china-media-battle/>）

美媒：中国货对美国伤害有多深？

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那些担心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会损害美国就业岗位的美国人说，对华贸易的利远大于弊。不过，新近发表的研究表明，对华贸易给美国造成的破坏比这些经济学家想的要深重。这项由三位经济学家联手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挑战贸易最终有利于经济这一传统观点。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最后确实找到了新的工作或退了休，而贸易带来的好处却留存了下来，比如更低的价格。问题是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超出了人们适应的正常过程。

麻省理工学院的奥特(David Autor)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汉森(Gordon Hanson)和马德里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的道恩(David Dorn)合作进行了这项研究。尽管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奥特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了部分资助，这项研究却是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之外进行的。三位经济学家同时发现，受中国输美商品影响越大，失业保险、食品券、残疾人补助及其它政府福利支出增加的幅度也越大。经济学家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大的损失，因为政府为了福利支出而征收更高的税率，以及考虑到福利会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都会令经济运行的效率更低。

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家欧文(Douglas Irwin)说，新研究描绘的景象过于黯淡；双边贸易带来的很多好处没有被提及，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衡量这些好处。例如，作为美国的出口对象，很多大宗商品生产国都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导致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上升。欧文说，如果我们出口到澳大利亚的重型装备（比如卡特彼勒的产品）的数量上升，这不会被算作美国对华贸易带来的好处的。值得注意的还有，经济衰退、业务外包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而非中国输美商品的增加）导致了美国制造业许多工作机会的损失。

目前，这项研究还在等待同行评审，但三位经济学家已经在多次会议上展示过研究结果。在较早期的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计算后发现，对华贸易的“所得”完全被政府福利支出增加导致的“所失”给抵消了。一些与会者就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三位经济学家没有适当说明，中国输美商品的增量中，有多大比重是美国需求增加而不是低成本的中国商品最终胜过价格更高的美国商品所导致的。三位经济学家采用的是更为保守的研究方法。

（来源：http://www.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col_id=3&news_id=186978）

（编译：江宏春等）

焦点分析

美坚持对台军售关乎“南海棋局”

冯创志

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对台军售，引发中方强烈抗议。9月21日与22日，中国外交、国防和国新办三部委同时出面抗议，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22日敦促美方纠正售台武器的错误做法，立即撤销上述错误决定，中国副外长召见美驻华大使等一连串举动表明了中方的强烈态度。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中美两军交往逐步频繁起来，为何美国仍然一个竟孤行坚持对台军售额度近60亿美元之巨？固然，美国奥巴马政府此举是出于国内政治压力，上百位美国议员联名施压，美国军火商也叫出通过军火生意复苏美国经济的漂亮口号；但依笔者看，美国此举却是其玩弄“南海棋局”中的一步棋。

美国近年提出重返亚洲战略以来，一直对东南亚紧盯不放；而亚洲战略焦点则是南海布局。而今，越南铤而走险拉印度加盟，邀请印度公司在中国南海进行石油天然气探索，背后则是美国因素起作用。美国和印度两国智库机构出台的报告认为，印度和美国“在中国事务上有很多共同战略目标”；又称，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强硬的行为引起美国、印度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担忧。新加坡媒体9月19日也直言不讳的道，澳大利亚与日本、韩国和美国已开始各自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进行协调，并计划在11月在印尼召开的东亚峰会共同提出“对中国的担忧”。这表明，围绕南海问题美国要当后台老板。

相比日印介入南海纠纷，似乎仍不能撼动中国。实际上，对于南海诸国而言，最大的忧虑不在乎日印介入。毕竟，从已出台的国际法则而言，印日这两个与南海关系不大的国家，一旦卷入南海纠纷，也是自找苦头。在南海问题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目的更为明确，无论是菲律宾，还是越南，就是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避免与中国单打独斗。这必然给区域外国家，比如印度、日本带来搅局的机会。他们互有需求，背后又有美国撑腰，在南海的动作自然会越来越不加掩饰。

台湾是南海的前沿，台湾最靠近西沙，一旦台湾与大陆携手共同维护南海，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对付南海问题的一张十分过硬的王牌。前一段时间，针对越南、菲律宾对南海的主

权争论，台湾军方计划在6月底到南海进行军演。台湾与中国大陆一道发出声音，令这些国家陡添几分怯意。1974年，中国海军西沙一战，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介石认为中华利益胜过两岸争斗，给大陆海军开绿灯。一旦两岸携手同仇敌忾，对外形成统一拳头，就会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而今，在美国的支持下，越南菲律宾制造南海矛盾，当然引发两岸中国人的抵制。因此，挑拨台海关系紧张，就成了一个很管用的策略。

众所周知，台湾正值大选，国民党与民进党围绕两岸政策展开博弈。而来自在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竞选纲领显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推进所谓“台海共识”。在美国一些人士看来，两岸之间最佳状态是“不统不独”，但不等于美国希望两岸风平浪静。一旦台海风平浪静，大陆经济发展就会更快，经济总量不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而且有可能追赶美国，美国就认为“中国经济威胁论”，对他们推进亚洲战略带来障碍。因此，需要在台湾设置障碍，以台湾拖住大陆。反观马英九执政几年，大陆与台湾之间事实上处于和平发展状态，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就显得不利。因此，美国打蔡英文的主意，就成了顺水推舟。在蔡英文访美期间，美国宣布对台军售近60亿美元，远远超过近几年的军售数目，这不寻常的背后，人们不难嗅出美国个中的深层用意：对台军售煽动“台独”，拖累中国。一旦南海出现紧张局面，台湾就有可能出现只当观众甚至在美国唆使下对中国大陆“设防”，那么，中国处理南海就大大增加政治成本与军事成本。因此，说美对台军售是美国亚洲战略，更直接说是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的一个棋局就不难理解。

今年7月，美国参联会主席曾公开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发现美国将是转向亚太。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也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军事策略，在台湾之间制造紧张局面，就是美国的这个战略之一。因此，分析美国此次不顾中方强烈抵制，也不顾中国持有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事实，硬要推进对台军售，应看到美国亚洲战略这个大题目、大布局。当然，形势比人强，美国插手南海也罢，通过军售，在两岸重煽对抗也罢，只是一厢情愿，台湾公众已尝到了两岸对抗的苦头和两岸和谐的甜头，硬要通过台湾政客搞搞新意思，加重台湾人民的负担，最终也会弄巧反拙。

（秋涛编辑）

日本与菲律宾加强安全合作 意在抗衡中国

《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文章称，日本和菲律宾正在探讨多种途径，以加强两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日菲两国均与中国有领土争端且不断深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周对记者说，他将于9月7日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晤时提出安全问题，希望得到野田佳彦在中国与其邻邦就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方面的支持。

日本首相办公室一位高级官员本月26日接受采访时说，野田佳彦和阿基诺三世可能会探讨如何增加两国联合海岸巡防演习以及两国海军官员的互商。这位官员说，在推动这类合作方面，两国有增进往来的空间，还说日本和菲律宾政府在有关共享“南中国海”和平航行与和平使用的重要性方面有着共识。南海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美国和日本目前均依赖该海域仍开放的航线进行航行。日本90%的石油供应是从中东取道南海运抵日本的。中国表示自己拥有南海的全部主权，但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也称对其中的关键海域拥有主权。

虽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希望达成更为统一的立场并已成功争取到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支持，但中国更愿意与个别国家进行单独谈判。相比美国，日本较不愿意支持东南亚国家对抗中国。但知情人士说，东京方面可能在权衡是否要效法美国，即敦促有关方面举行一系列多边谈判来解决南海争端。

研究安全问题的分析师说，为拟定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一个共同战略以方面，菲律宾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阿基诺在今年9月初结束访华后，便造访了美国。新南威尔士大学澳洲国防军事学院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塞耶(Carlyle Thayer)指出，阿基诺是在定一个基调。《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日本方面对菲律宾做出的任何新承诺都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加强两国安全合作是个长期过程。

本月早些时候，日本与菲律宾在东京正式举行了有关加强两国海上合作的双边磋商，这是自2006年12月两国同意展开对话以来的首次。近年来还举行了几次日本和菲律宾均有参加的联合军演。另外，日本政府将于近期在东京举办一个为期两天的东南亚防务官员大会，主题是“共同的安全任务”，其中包括“安全问题和资源问题”以及“加强本地区海上安全努力”等分项议题。日本防卫大臣将在周三的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预计将有来自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10个国家的官员出席大会。

（牛俊根据《华尔街日报》相关文章编辑）

中国能够经受住经济风暴的考验吗？

鲍泰利 (Pieter Bottelier) *

三年前，雷曼兄弟破产把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三年后，中国的经济又一次展翅腾飞。然而，许多观察人士担忧，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种担忧源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但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硬着陆”。

与几年前相比较，现在的中国经济结构更趋合理。虽然外界曾普遍预测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会跌至 50 点以下，但实际情况却是从 7 月份的 50.7 小幅升至 50.9。与此同时，私人投资增幅远高于政府投资。

“十二五”规划制定了 7% 的年均经济增长目标，但是 2011 年的经济增幅却远高于这一数值，虽然如此，中国经济还是需要放缓增长速度，并且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即便经济增长降速过快而需要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依然有财政空间去实施此类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并且做好了应对经济增长模式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准备。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从 2007 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并调控国内过热的房地产市场，2008 年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导致 2008 年第四季度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上千万的工人没了工作，其中建筑、出口和制造业受影响最严重。

雷曼兄弟破产的几周内，北京方面就迅速采取措施应对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系列消费者补贴项目、拓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新的富有雄心的国家支持“经济适用房”计划。尽管刺激方案存在明显的缺陷——严重依赖政府投资，导致浪费现象，并助推房市泡沫继续膨胀——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就业率和经济增长迅速好转。截止到 2009 年中，劳工短缺现象开始出现，并且工人实际工资的涨幅也快于危机前。2010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 10.4% 的强劲增长；2011 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 9.6%。外界普遍预测中国 2011 和 2012 全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将为 9.3% 和 8.8%。

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复苏，却也让外界产生了新的担忧。通过大幅提高（主要是政府支

*鲍泰利，世界银行中国区前任行长，卡内基国际经济项目非常驻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SAIS) 中国研究资深副教授。

持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2009 年经济增长的 90%——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投资。这种转变暂时性地帮助中国政府维持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然而 2010 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46%，北京方面也承认这种投资水平是不可持续的。此外，新的对于经济过热的担忧，尤其是房地产领域，也开始出现，促使央行在 2009 年第三季度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展望未来：问题会出在哪里？

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但是放缓的步伐和幅度会有多大呢？在宏观经济层面，未来五年的首要问题是家庭和政府消费是否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以弥补资本投资不可避免的降速。由于中国的家庭消费已经在以年均 10% 的速度增长——到目前为止稍快于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短期内不可能再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事业（主要是教育、卫生和和社会保障）的预算开支，实现总开支的显著增长。幸运的是，中国为此支付得起。

如果政府开支不断快速增长，实际工资的涨幅继续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并且消费信贷持续改善——这三者看起来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段时间就可以看成是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到了最低点（2009 年时大约为 48%）。假如投资的质量可靠，随着投资增长步伐的放缓，未来几年能够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

然而，中国的领导人决不能洋洋得意，必须预防其他风险的出现。

首先，高企不下的通胀水平——8 月份为 6.2%，稍低于 7 月份的 6.5%——依然是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通货膨胀上升源于近几年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包括猪肉在内的一些重要食品的价格上个月涨幅出现下降——CPI 很可能在 7 月份已经创下了最高值。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依然会高于正常水平，因为经济系统内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全球经济放缓，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及不断增加食品和饲料进口（尤其是玉米），以及政府额外释放猪肉储备并从美国进口猪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通胀压力将缓和。

此外，中国政府依然担忧房地产泡沫，自 2010 年 4 月以来，政府已经积极地抑制东部大城市居民住宅的投机性投资。这一消息也是很令人欣慰的。虽然官方的房价统计数据不可靠，但是是一些非官方的数据证实近几个月城市房价和地价已经升停，甚至在 7 月份和 8 月份出现了小幅下降。然而，价格下跌必须平稳实现。虽然东部城市的住宅负担能力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会像 2008 年的美国那样严重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由于存在十分强劲的基础需求，中国不大可能出现美国式的房价暴跌。

尽管已经有很多人提到了中国的债务问题，但债务问题依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讨论的焦点

主要放在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地方政府拥有的投资公司的债务问题，这些公司通过举债为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中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融资。官方的数据估计 2010 年末地方政府的总债务达到了 10.7 万亿人民币（约合 1.7 万亿美元，占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27%），但是一些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真实的数值高达 14 万亿人民币。

一些地方政府有可能出现部分债务违约；不过，中央政府肯定会进行干预，阻止国有银行受到这些债务的影响。中国所有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记录在案的总债务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0%，远低于美国和其他比较大的西方经济体。并且，经济和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表明中国总体的财政状况实际上十分稳健。

然而，私营部门的债务更令人担忧。如果房价和地价大幅下跌以及楼房销售放慢，那么中国一些大型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公司就会陷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这些公司的杠杆率非常高。如果经济增长比预期（和计划）放缓得更快，那么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债务问题就将出现。和国有企业相比，政府不大可能救助私人借贷者——即使他们欠国有银行的钱。对于那些对私营部门放贷（尤其是建筑贷款）过多的银行，它们的信誉将成为一个问题。

并且，西方国家的二次衰退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即使在金融上中国与这些国家保持相对隔绝，贸易联系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尽管中国很难阻止美国出现二次衰退，但是可以利用其巨大的外汇储备加强欧洲主要银行的资本金，这会有助于解决欧元危机并且对各方都是双赢的解决方案。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过于自信就会犯错误。自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决策通常都要经过仔细的考虑并最终达成统一意见。然而，2009 年中国在快速恢复经济增长势头并接近实现充分就业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很有可能让决策者们自鸣得意而粗心大意。

可以确信，这些问题会阻碍中国维持高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计划。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让中国做好了应对这些难题的准备。

（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国际经济公报》（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ulletin）2011 年 9 月 15 日）

（王子磊译，吴其胜校）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 编： 200020
电 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